

从社会思想的角度分析：二战时期各主要参战国的立场选择

作者

彭煜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日期：2024年6月15日

摘要

本文旨在利用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从二战时期各主要参战国的社会情况和文化背景来分析其立场选择的原因。通过对德国、苏联、英国、美国、中国和日本在二战时期的社会阶层结构和政治背景的深入探讨，揭示出各国在战争中的立场选择如何受到其内部社会思想和阶层分布的影响。本文结合古希腊时期智者学派及三位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社会思想，对这些历史经验进行了分析，探讨其对现代社会的启示和反思。本文认为，国家的领导人和各社会阶层共同决定了国家的立场选择，从而影响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和命运。

关键词：社会学，二战，社会阶层，政治哲学，古希腊哲学，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1 引言

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阐述了他对人类生活形式的高度概括——“就其本性而言，人是政治的动物。”^[1]对于希腊人而言，在人类共同体所有必要活动中，只有两种活动被看成是政治性的，构成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生活即行动和言语。^[2]他（亚里士多德）和他的恩师（柏拉图）在对希腊城邦的分析中都保留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国家（那时是为城邦）要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行动时才最健康。柏拉图甚至认为理想中的国家应当如同一个人一般，国家的各个阶级、组分就像人的器官，相互协调，各司其职，如此保证其繁荣富强。

虽然在当今看来，我们不应该过分地强调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同个体一般行动，但一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选择和命运，实在是与其各个阶级、各个组分息息相关。依据这样的思想方针，本文将尝试对二战时期各主要参战国的各个社会阶层进行分析，找出其立场选择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通过深入探讨德国、苏联、英国、美国、中国和日本在二战时期的社会阶层结构和政治背景，我们希望能够揭示出各国在战争中的立场选择如何受到其内部社会思想和阶层分布的影响。再结合古希腊时期智者学派对社会结构的看法进行一些分析，我们将探讨这些历史经验对现代社会的启示和反思。

2 背景介绍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和影响深远的全球性战争，涉及到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战争分为两个主要战场：欧洲战场和亚太战场。战争爆发的直接导火索是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随后英国和法国对德宣战。随着战争的进行，轴心国阵营（德国、意大利、日本）和同盟国阵营（英国、苏联、美国、中国等）形成了明确的对立格局。二战不仅是国家之间的军事对抗，更是各国社会内部政治、经济和思想斗争的外在体现。

在二战爆发前，各主要参战国的社会思想和政治结构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决定了各国在战争中的立场和策略，也深刻影响了战争进程和结果。

在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德国，推行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试图通过战争扩大领土和实现所谓的“雅利安人优越论”。纳粹党通过宣传机器和恐怖手段控制了社会的各个方面，重塑了德国的社会阶层结构。^[3]纳粹德国的社会阶层主要包括以希特勒和纳粹高层为代表的党政官员、军事精英、工业资本家以及受压迫和被迫害的少数族裔，尤其是犹太人。国内的社会阶层因纳粹党的极权统治而被重塑，形成了一种高度军事化和等级分明的社会结构。

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实施了严格的中央计划经济 and 高度集权的政治控制。^[4]苏联的社会阶层主要由党政官员、工人和农民组成。斯大林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清洗和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巩固了对社会的控制，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工人和农民在战争中被动员起来支持战争努力，形成了一个高度集中的战时社会。

作为传统的自由民主国家，英国在二战前面临着复杂的社会阶层结构，包括贵族、工业资本家、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二战期间，英国的社会动员和战时经济政策促进了各阶层的合作。丘吉尔政府通过战时内阁和紧急立法，实施了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动员，确保了国内生产和军事供应。同时，战争也暴露了英国社会深刻的阶级矛盾和经济压力，推动了战后社会改革的呼声。

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社会经历了重大变革，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中产阶级和强大的工业资本。二战的爆发使得美国迅速从经济大萧条中恢复，并成为同盟国的重要经济和军事力量。美国社会的多元化和民主制度在战时表现出强大的动员能力，政府通过一系列战时经济措施和社会动员策略，调动了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使其成为战争机器的一部分。

中国在二战期间正处于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同时还面临着国共内战的复杂局面。^[5]社会阶层主要由地主、农民、工人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框架下，虽然合作对敌，但内部的政治斗争依然复杂激烈。各阶层在战争中的角色和立场深受国内政治斗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农民和工人被广泛动员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

日本在二战前夕形成了一个由天皇和军部主导的军国主义国家，社会阶层包括军人、官僚、工业资本家和农民。军国主义思想主导下，日本社会高度一致地支持战争扩张。政府通过教育、宣传和社会控制手段，强化了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动员了大量人力和资源支持战争。同时，这种高度集中的战时体制也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紧张和矛盾，尤其是在战争后期资源枯竭和社会动荡加剧的情况下。

3 主要参战国的社会阶层分析

3.1 德国的纳粹党和社会阶层

在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德国，社会阶层结构经历了显著的变化。纳粹党的极权统治重塑了德国的社会阶层，将社会划分为几个主要的阶层。首先，纳粹党和党政官员占据了社会的最高阶层，包括希特勒及其核心圈子。纳粹党在德国社会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掌握着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大权。党政官员享有特权，控制着国家的方方面面。

其次，军队和军事精英在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纳粹德国极为重视军事力量，军事精英包括国防军和党卫军的高级军官，他们不仅在军事上有影响力，也在政治上扮演关键角色。此外，工业资本家作为第三个重要阶层在纳粹时期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通过与纳粹政权的合作，他们获得了大量的政府合同和特权待遇，形成了一个与政权紧密联系的工业精英阶层。

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纳粹统治下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动员和控制。纳粹党通过宣传和社会福利政策争取这些阶层的支持，同时实施严格的社会控制和镇压措施。最后，被迫害的少数族裔，包括犹太人、吉普赛人、同性恋者和其他被纳粹视为“劣等种族”或“不符合雅利安标准”的群体，遭受了系统性的迫害和种族灭绝政策。这些群体在社会中被彻底边缘化，受到极端的歧视和暴力。

3.2 苏联的斯大林模式

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实行严格的中央计划经济和高度集权的政治控制，这使得苏联社会阶层结构具有独特的特点。苏联社会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层：

首先是党政官员阶层。这一阶层包括苏共的高级领导人和各级政府官员，他们掌握着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命脉。由于斯大林主义的极权统治，党政官员在社会中享有特权，并通过政治清洗和镇压保持对国家的严格控制。

其次是工人阶层。工人阶层是苏联经济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被赋予“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重要地位。工人不仅是工业生产的主要力量，也是苏联政府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的重要对象。

第三是农民阶层。尽管农民在数量上占据了苏联人口的很大比例，但在斯大林的集体化运动中，农民阶层经历了极大的苦难。集体农庄制度和强制性的农业政策使得农民失去了土地的所有权，生活条件也十分恶劣。

最后是知识分子阶层。在苏联，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工程师、教师和文化工作者等。尽管知识分子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他们的地位并不稳定，经常受到政治风潮的影响。

苏联的阶级斗争贯穿了整个社会结构。斯大林通过阶级斗争理论，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通过政治手段和意识形态教育，确保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阶级斗争不仅在经济领域表现出来，也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广泛存在。政治清洗和大规模镇压行动是斯大林巩固权力的重要手段，这些措施强化了党政官员的权力，控制了社会的各个层面。

3.3 英国的社会阶层与政治传统

作为传统的自由民主国家，英国在二战前面临着复杂的社会阶层结构。英国社会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层。

首先是贵族和上层阶级。这个阶层包括传统的土地贵族、金融寡头和高层官员。他们掌握着大量的土地和资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力。英国的贵族阶级在保守党中占据重要地位，维护传统的保守政治和社会秩序。

其次是工业资本家和中产阶级。工业革命以来，工业资本家和新兴中产阶级迅速崛起，成为推动英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中产阶级包括企业家、专业人士和小企业主，他们在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支持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改革。

第三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主要由工厂工人、矿工和其他蓝领工人组成，他们在工业生产中起着核心作用。工人阶级在工会的组织下，积极争取劳动权益和社会福利，对英国的劳工运动和工党有着重要影响。

最后是下层阶级。这个阶层包括贫困人口、失业者和低收入家庭，他们在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面临较大的经济压力和社会歧视。下层阶级在战争期间得到政府的特殊关注，通过社会福利政策获得了一定的改善。

3.4 美国的社会阶层与民主制度

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社会经历了重大变革，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中产阶级和强大的工业资本。美国社会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层。

首先是政府官员和政治精英。这个阶层包括联邦政府的高级官员、国会议员和各州的政界人士。他们通过民主选举获得权力，并在制定和执行国家政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罗斯福新政加强了联邦政府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中的干预，使政府官员在社会中具有较高的影响力。

其次是工业资本家和企业家。这一阶层由大型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组成，他们控制着美国的主要经济资源。工业资本家在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方面扮演关键角色，尤其在战争时期，通过军事

合同和生产扩张，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经济地位。

第三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包括专业人士、小企业主、教师、医生和公务员等。他们在社会中占据重要位置，是美国民主制度的中坚力量。中产阶级的经济稳定性和政治参与积极性，使他们成为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推动者。

第四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主要由制造业工人、建筑工人和服务业员工组成。他们是美国工业和服务业的基础力量，通过工会组织争取劳动权益和社会福利。工人阶级在战时动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支持政府的生产和军事政策。

最后是少数族裔和贫困阶层。这一阶层包括非洲裔美国人、拉丁裔、亚裔移民和其他少数族裔，以及贫困人口和失业者。尽管他们在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但在战争期间，他们也积极参与了军事和工业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3.5 中国的社会阶层与政治背景

在二战期间，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同时还面临着国共内战的复杂局面。中国社会阶层也较为复杂。

首先是地主阶层。这一阶层包括大地主和乡绅，他们在农村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地主阶层通常与国民政府有着紧密的联系，支持政府的抗日政策，但也受到日军侵略和战争破坏的严重影响。

其次是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由工商企业家和城市中产阶级组成，他们在城市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民族资产阶级支持抗日战争，希望通过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他们对国民政府的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也面对着日军的经济掠夺和国内市场的萎缩。

第三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工业和矿业部门，他们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力量。工人阶级通过工会组织争取劳动权益，并积极参与抗日活动。工人阶级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生产和支援作用，支持国家的抗战努力。

第四是农民阶层。农民阶层是中国社会的主要构成部分，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在农村经济中扮演关键角色，但生活条件普遍贫困。抗日战争期间，农民阶层是主要的抗战力量，他们不仅提供粮食和物资支援，还积极参与游击战和抵抗运动。

最后是知识分子阶层。知识分子包括教师、学生、学者和文化工作者，他们在社会变革和思想启蒙中发挥重要作用。知识分子阶层普遍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积极参与抗日宣传、文化动员和教育工作，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6 日本的社会阶层与天皇制

在二战前夕，日本形成了一个由天皇和军部主导的军国主义国家。日本社会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层。

首先是天皇和皇族阶层。天皇作为国家的最高象征，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天皇制是日本政治和社会的核心，皇族成员在国家的政治、军事和文化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天皇在军国主义的推动下成为军事扩张和民族主义的象征，号召全国人民支持战争。

其次是军部和军事精英。这一阶层包括高级军官、将领和军事领导人，他们在国家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军部通过一系列的军事政变和政治操作，逐步掌握了国家的实权，推动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和扩张的道路。

第三是工业资本家和企业家。工业资本家在日本的工业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控制着大量的经济资源。通过与军部的紧密合作，他们在战争经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工业资本家不仅提供军事物资和装备支持，还在战争政策的制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是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中产阶级包括专业人士、学者、教师和公务员等，他们在社会中占据重要位置。知识分子阶层在军国主义的影响下，普遍受到民族主义教育和宣传，支持国家的扩张政策。但也有部分知识分子对军国主义持批判态度，反对对外侵略。

最后是农民和工人阶层。农民是日本社会的主要构成部分，占全国人口的很大比例。工人阶层集中在城市的工业和矿业部门，是工业生产的主要力量。农民和工人在战争期间被广泛动员，支持国家的战争努力，但也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和剥削。

4 智者学派和古希腊三贤

古希腊时期，智者学派和三位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社会结构和政治哲学提出了深刻的见解。这些思想不仅对当时的希腊城邦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后世的社会和政治理论奠定了基础。

4.1 智者学派：社会学分析的最初尝试

智者学派（Sophists）在古希腊以其相对主义和诡辩术著称，他们主张知识和道德是相对的，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 and 影响。智者学派认为，法律和道德规范并非绝对真理，而是由人类社会共同制定的。因此，他们强调培养个人的辩论能力和实际政治技巧，以便在公共事务中取得优势。

智者学派的思想对社会阶层的看法具有实用主义倾向。他们认为，社会阶层和政治权力的分配应基于个人的能力和实际表现，而非血统或传统地位。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发展，因为它倡导通过教育和辩论来提升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

4.2 苏格拉底：知识即美德

苏格拉底（Socrates）是古希腊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强调道德哲学和伦理实践。苏格拉底主张“认识你自己”，强调通过内省和理性思考来追求美德。^[6]他认为，美德是知识，只有通过不断的自我反思和对话，人们才能达到真正的智慧和道德。

在政治方面，苏格拉底质疑当时雅典的民主制度，认为多数人的意见并不总是正确的。他主张由贤人（philosopher-kings）来治理国家，因为他们具备真正的智慧和道德品质。苏格拉底的思想对后来的柏拉图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他对理性和美德的重视。

4.3 柏拉图：理想国

柏拉图（Plato）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在《理想国》中详细阐述了他的政治哲学。柏拉图主张国家应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由不同阶层的人各司其职，和谐运作。^[7]他将社会分为三个主要阶层：统治者（哲学家）、战士（守护者）和生产者（工匠、农民）。

柏拉图认为，只有哲学家统治者具备治理国家的智慧和美德，他们应该通过长期的教育和训练，掌握理性和正义的原则。战士阶层负责保卫国家，他们应当具有勇敢和纪律。生产者阶层则负责提供物质资源，满足社会的基本需求。柏拉图的理想国强调各阶层之间的分工和合作，通过严格的教育和制度安排，确保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4.4 亚里士多德：现实主义政治观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是柏拉图的学生，他在《政治学》中提出了更加现实主义的政治观。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的本质是一个由多个部分组成的整体，每个部分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地位。他强调中庸

之道，主张通过法律和制度来平衡各阶层的利益，确保社会的稳定和正义。

亚里士多德将政治制度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也称混合制），并认为每种制度都有其优缺点。他主张通过混合制度来结合各制度的优点，避免极端和专制。他还强调公民的美德和教育，认为公民应当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亚里士多德的现实主义政治观注重实践和经验，主张通过观察和分析现实社会来制定合适的政治制度。他的思想对后来的西方政治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对中世纪和近代的政治哲学。

综上所述，智者学派和古希腊三贤的社会思想为我下文对二战时期各主要参战国的立场选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5 对主要参展国的社会学分析

5.1 社会领导阶层

古希腊三贤均强调“贤人政治”，他们认为领导一个国家的应当是整个社会中最有能力，最富学识的一批人。他们的思想和选择决定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5.1.1 德国：希特勒与纳粹党

二战其的纳粹党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影响了德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首先，他们通过广泛的宣传机器和教育系统，向全社会灌输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思想。媒体、学校和社会组织被用来传播纳粹意识形态，塑造公众的思想和行为。接着，纳粹党实施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如“劳动阵线”和“强制就业计划”，以缓解经济困境，赢得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支持。同时，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扩张和战争经济，促进工业资本家的利益。最后，纳粹党利用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和集中营系统，对政治异议者、少数族裔和其他被视为敌对的群体进行严厉的镇压和迫害。恐怖手段不仅维持了政权的稳定，也在社会中制造了普遍的恐惧。

希特勒及其领导的纳粹党就是用这样的手段将自己极端的民族主义推向了全国各个阶层，在整个国家掀起了一股战争热潮。这样的热潮在德国战胜法国，以胜利者的姿态一血一战屈辱后达到高潮，并引导着德国在漫长的战争中逐步走向失败。

5.1.2 苏联：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

二战时期，斯大林通过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和镇压行动，巩固了党政官员阶层的权力。党内的异见者和潜在的对手被清除，使得苏共内部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

他实施了严格的中央计划经济和高度集权的政治控制。通过五年计划和集体化运动，推动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工人阶层在五年计划中被赋予了重要的角色，他们被动员起来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虽然工人阶层也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和严苛的劳动条件，但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农民阶层则在集体化运动中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强制性的集体化政策导致了农业生产的混乱和饥荒，农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许多农民被迫离开家乡，进入城市或被流放到边远地区。这一过程中，农民的土地被集体化，个人的经济独立性被剥夺，导致了社会的巨大动荡。

知识分子阶层在斯大林时期也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一方面，苏联政府重视科技和教育的发展，投入大量资源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常常成为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他们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受到严格限制。许多知识分子被迫接受再教育或被清洗。

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苏共通过以上手段，将极权主义和集权经济模式推向全国各个阶层，形成了一种高度集中、等级分明的社会结构。通过这种方式，苏联社会被动员起来支持国家的工业化和军事扩张计

划。在战争爆发后，苏联的这种高度集权的社会结构和动员能力在抵抗纳粹入侵和最终取得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5.1.3 英国：张伯伦和丘吉尔

英国在二战期间的社会领导阶层主要集中在内维尔·张伯伦和温斯顿·丘吉尔两位首相身上，他们的政策和领导风格对英国的战争立场产生了深远影响。

内维尔·张伯伦在 1937 年至 1940 年担任英国首相期间，以其推行的绥靖政策著称。他试图通过与德国和意大利等国的谈判，避免战争的爆发。张伯伦认为，通过满足德国的某些要求，可以维护欧洲的和平。这一政策在 1938 年的《慕尼黑协定》中达到顶点，当时英国和法国同意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以换取希特勒的和平承诺。他的政策在初期得到了部分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支持，因为他们希望避免战争的破坏。然而，随着德国的侵略行为加剧，公众对绥靖政策的信心迅速下降。

温斯顿·丘吉尔在 1940 年接替张伯伦成为英国首相，他以坚定的反抗纳粹德国的立场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丘吉尔强调通过坚决的军事抵抗和国际联盟，击败纳粹德国。他动员了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激发了全民的爱国热情。丘吉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社会福利和战时经济政策，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生产的持续进行。英国也正是因为丘吉尔对希特勒的正确判断避免了同其他欧洲国家一般的命运，使得英国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逐渐找回了与德国对抗的能力和决心。这也深刻影响了整个战争的走向和战后世界格局的演化。

5.1.4 美国：罗斯福

在二战期间，美国的社会领导阶层主要集中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身上。他的政策和领导风格对美国的战争立场及全球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自 1933 年起担任美国总统，并在他的领导下，美国实施了“新政” (New Deal)，以应对大萧条带来的经济困境。在二战爆发前，罗斯福注重国内经济复苏，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如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公共工程项目的实施等，这些政策不仅帮助美国走出了经济低谷，也为其后来的战争准备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战初期，美国遵循中立政策，罗斯福签署了多项中立法案，限制对交战国的军火销售和贷款。然而，随着战争在欧洲和亚洲的升级，特别是英国在 1940 年面临的巨大压力，罗斯福逐渐认识到美国最终无法置身事外。他通过“租借法案” (Lend-Lease Act) 向英国及其他反法西斯国家提供物资和军事援助，使美国成为“民主的兵工厂”。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袭击珍珠港，直接促使美国全面参战。罗斯福迅速向国会申请宣战，并在广播中向全国发表了著名的“耻辱日”演讲，极大地激发了美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战斗决心。从此，美国进入战时经济模式，大规模生产武器装备，并征召大量士兵加入军队。罗斯福的领导使美国迅速从一个大西洋两岸的“孤立主义”国家，转变为全球反法西斯联盟的重要成员。

罗斯福在战时领导中强调与同盟国的紧密合作，特别是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关系。他参与了多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如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这些会议决定了战时和战后的国际秩序。罗斯福的战略眼光和外交手腕，为盟军最终战胜轴心国奠定了基础。

5.1.5 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

中国在二战开始前便开始了与日本的侵华战争，这次战争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在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曾采取“不抵抗政策”。在 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中，当时的日军企图侵占中国东北，蒋介石命令东北军不予抵抗，希望通过国际联盟的干预解决冲突。然而，这一政策未能阻止日本的侵略，反而导致中国东北的沦陷，引发国内外的强烈批评。这样的软弱和对国际组织的不切实际的期盼一直持续到二战中后期，为中国的抗战之路埋下了许多隐患。

在 1937 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宣布全力抗战，试图通过持久战拖垮日本。蒋介石注重整合全国的抗战力量，尽可能地调动资源抵抗日本侵略。然而，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内部矛盾和前面提到的弊病，其战时的政治和军事组织效率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国际上，蒋介石企图寻求国际援助，特别是与美国和苏联的合作。他参加了 1943 年的开罗会议，与罗斯福和丘吉尔会晤，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国民政府还接受了来自苏联的军事援助和顾问，以增强对日作战的能力。在国内，蒋介石推行了一系列战时经济政策，试图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转和社会的稳定。尽管面临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国民政府仍然努力维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运作，以确保抗战的持续进行。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逐渐崛起，其领导人毛泽东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倡导并实施了游击战术，通过灵活机动的战术，牵制和打击日军。在敌后战场，中共利用其在农村地区的群众基础，发动民众参与抗战，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不仅为中共提供了物资和人力支持，也成为中共宣传和扩展影响力的重要平台。

在抗战期间，中共还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加强了党的组织纪律和思想建设。毛泽东的领导权威在此期间得到巩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显著提高。这为中共在战后的迅速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共在抗战期间也注重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特别是与苏联的关系。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与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合作，共同抗击日军。然而，这种合作关系随着抗战的深入而逐渐变得紧张和复杂。

中国在二战期间的抗战史，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努力的结果。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领导方式和政治路线。在抗战过程中，国民党承受了正面战场的巨大压力，而共产党则在敌后开展了有效的游击战。二者的共同抗战不仅打击了日军的侵略，也为中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然而，战后复杂的政治局势和两党的对立，最终导致了内战的爆发，深刻影响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轨迹。

5.1.6 日本：裕仁天皇和军国主义

在二战期间，日本的社会领导阶层主要集中在裕仁天皇和军国主义势力身上。他们的政策和领导风格对日本的战争立场及其在亚洲的侵略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

裕仁天皇（即昭和天皇）在 1926 年即位，是日本的象征性国家元首。在日本的天皇体制下，天皇被视为“国家和人民的象征”，但实际上在战前和战时的日本政治中，他的角色更加复杂。虽然天皇表面上不直接参与政治决策，但其地位赋予了他巨大的象征权威，军方和政府经常以天皇的名义推行政策。

在二战期间，裕仁天皇的责任和权力备受争议。尽管他在名义上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但实际的政治和军事决策主要由军方和政府高层制定。天皇在一些关键时刻发表过影响深远的声明，如开战宣言和最终的投降诏书，表明他在战争中的重要象征性作用。

二战结束后，裕仁天皇发表了著名的“玉音放送”，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天皇直接向公众讲话，他的投降诏书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日本民众接受了战败的现实。战后，裕仁天皇被保留了其象征性地位，但放弃了任何政治权力。

军国主义在日本的兴起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当时，日本通过一系列现代化改革，迅速崛起为亚洲的强国。伴随着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长，军国主义思想在日本社会中逐渐盛行。军国主义者主张通过军事力量实现国家的扩张和荣光，强调武士道精神和国家至上。

在二战前夕和战争期间，日本军方的政治影响力显著增强。1930 年代，日本国内政治不稳定，经济困境加剧，军方通过一系列政变和暗杀事件，逐步掌握了国家的实权。军部高层，如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实际上控制了政府的决策权，并推动了一系列侵略扩张政策，包括 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1937 年的全面侵华战争，以及 1941 年对美国的珍珠港袭击。这些战争不仅导致了广泛的破坏和人员伤亡，还伴随着严重的战争罪行，如南京大屠杀和 731 部队的生化实验。

日本政府在战争期间实施了严格的经济和社会控制。资源全面转向军事用途，实行战时配给制，并

通过宣传机器鼓动全国民众支持战争。政府和军方还推行了强制性的劳动力征集和军事训练，动员全国的青年参军作战。

裕仁天皇和军国主义势力在二战期间塑造了日本的政治和军事道路。天皇的象征性权威和军国主义的实际掌控，使得日本在战争中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也正是他们对战争局势的误判和一意孤行地战争欲望，导致日本在战争中逐步走向没落。

5.2 社会的一般阶层

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提出了一个高度集权体系的统一国家的概念，他认为国家应当作为一个有机体存在，各个阶层之间具有统一的信仰和明确的分工。亚里士多德师从柏拉图，他虽然反对老师的过分整体主义，但是也同样肯定了除领导阶层之外的社会各其他阶层的力量，他将国家比作合唱团，唯有各部分同理合作才能促成整体的和谐。^[8]因此我们要分析各参战国的立场选择，除了关注领导阶层外，还要充分考虑整个社会的思想倾向和立场。

5.2.1 德国：极端民族主义的狂潮

在二战期间，德国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受到纳粹宣传的强烈影响。纳粹党通过大规模的宣传活动、社会福利计划和经济政策，赢得了大量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支持。许多德国工人通过参与国防军和工厂生产，成为战争机器的一部分。

纳粹政权通过希特勒青年团等组织对青年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灌输纳粹思想，鼓励青年参与军事训练和战争动员。教育系统也被全面纳粹化，学校课程中充斥着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内容。

在这样的条件下，德国在战争前期几乎势如破竹地战胜了大部分欧洲国家，国内对希特勒和纳粹党的支持空前高涨。年轻一代的德国人也普遍认同纳粹的极端民族主义。德国便在这样的举国之力下将战争推向了己无法掌控的局面。甚至在战败后，德国内部仍存在相当一部分不愿接受战败事实的声音。

5.2.2 苏联：万众一心的抗战思潮

在二战期间，苏联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苏联红军的重要支柱。苏联政府通过强制征兵和动员大规模的劳动力资源，来支持前线的作战和后方的生产。斯大林的宣传机器极力强调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号召全国人民保卫祖国。通过宣传，许多苏联工人和农民被塑造成无私奉献的英雄形象。

苏联的教育系统在战时强化了对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灌输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青年被动员加入共青团，接受军事训练，准备随时参战。工人和农民不仅在生产战线上贡献力量，还积极参与军事行动，成为红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这种全民动员和强烈爱国主义的推动下，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展现了强大的战斗力和韧性，最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和柏林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然而，战后苏联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许多家庭在战争中失去了亲人和财产。

5.2.3 英国：从绥靖到决不投降

在二战初期，英国社会对首相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产生了广泛的不满。张伯伦政府试图通过让步和妥协的方式避免战争，但这一政策被许多英国民众视为软弱和投降。随着德国在欧洲的侵略行动不断升级，反对绥靖政策的声音越来越大，最终导致了英国党派对张伯伦的弹劾。

张伯伦下台后，温斯顿·丘吉尔接任首相。然而，丘吉尔在上台初期面临着来自张伯伦及其同僚的抵抗，他们仍然试图通过意大利与德国达成和解，避免战争进一步扩大。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下，丘吉尔坚信必须抗争到底，但他也意识到需要获得民众的支持。

据传，丘吉尔在一次外出乘坐地铁的过程中，偶然了解到群众对坚持斗争的强烈意愿。地铁里的普通市民向丘吉尔表达了他们对纳粹德国的愤怒和抗争到底的决心，这深深地触动了。丘吉尔由此坚定了拒绝投降的决心，决意带领英国人民抗战到底。

丘吉尔的坚定领导和决心在随后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中得到了体现。英国军队和数万名盟军士兵在德军的猛烈攻势下被迫撤退，但在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参与下，成功组织了大规模的撤退行动，挽救了大量士兵的生命。这一事件不仅鼓舞了英国人民的士气，也为后来的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

此外，英国社会心理在战争选择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自工业革命以来，英国一直被视为世界的霸主，这种历史成就感和民族自豪感深深根植于英国人民的心中。面对纳粹德国的威胁，许多英国人不愿看到自己国家的地位和尊严受到挑战，他们视抵抗侵略为维护国家荣耀和世界秩序的责任。

正是社会一般阶层的这种抗战意愿，推动着英国走向决不投降，斗争到底的历史道路，为后期战胜法西斯联盟奠定了基础。

5.2.4 美国：孤立主义与炉边谈话

在二战初期，美国奉行孤立主义政策，民众普遍反对参战。美国在一战中遭受了巨大损失，许多美国人不愿再卷入欧洲战争泥潭。孤立主义情绪在美国社会中广泛存在，这一立场也在国会中得到了反映，形成了对参战的强大阻力。

然而，随着战争在欧洲和亚洲的不断升级，尤其是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美国的战争立场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通过“炉边谈话”等形式的广播讲话，逐步改变了民众对参战的态度。罗斯福在谈话中阐明了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并强调了美国参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这些“炉边谈话”不仅有效地缓解了公众对战争的恐惧，也增强了他们对政府决策的信任。罗斯福通过真挚的语言和详细的解释，使民众理解到参战不仅是为了保护美国自身的利益，也是为了维护全球的自由与正义。随着宣传工作的深入，公众的反战情绪逐渐被支持参战的热情所取代。

美国进入战时经济后，生产力迅速提高。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的战时动员和经济调控政策，推动了工业生产的快速转型。工厂开始昼夜不停地生产军需物资，工人阶级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大量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铆钉女工”，大幅度缓解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美国的参展意愿从绝对中立到逐渐倒向协约国阵营，美国一般阶层的意愿在其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其进入战时经济后的巨大生产力也来源于民众对国家的支持。种种倾向最终使得美国具备了左右战争走向的强大实力，在全球范围内扮演了关键的胜利角色。

5.2.5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二战期间，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长期受到西方列强的压迫和剥削。这种屈辱的历史经历在中国民众中积累了强烈的民族情绪。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人民表现出了顽强的抵抗精神和高度的民族觉醒。

尽管抗战初期中国的东北三省被日军迅速占领，但全国人民从未放弃斗争。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各地的抗日力量通过游击战、地雷战等方式，持续不断地对日军进行打击。无论是军队还是普通民众，都展现出了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

此外，国民党政府之所以从最初的不抵抗政策转向积极抗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国民众的强烈抗战情绪。最著名的事件之一是西安事变，1936年，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迫使他同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全面抗日。西安事变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进一步激发了民众的抗战热情，并促成了国共两党的合作。

中国最终能够取得抗战胜利，关键在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共两党在民族危机面前实现合作，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一战略举措使得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都团结起来，共

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在长达十几年的抗日战争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统一战线不仅整合了军事力量，还动员了广大民众参与到抗战中。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商人等各阶层人民纷纷投身于抗日斗争，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中国的抗战不仅仅是前线士兵的战争，也是全体国民的共同抗争。民众通过各种形式的抵抗活动，如组织抗日救国会、参加抗日宣传队、支援前线物资等，积极支持抗战。教育系统也在此期间起到了重要作用，学校和教师通过各种方式培养学生的抗日意识和民族精神。

全国各地的民众以各种方式支持抗战，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抗日救亡活动中。妇女们组织起后方支援队，为前线士兵缝制衣物、筹集物资；工人们在工厂里加班加点，生产军需品；学生们通过演讲、出版报刊等形式，宣传抗日思想，动员更多人加入抗战行列。

在这场持久战中，中国人民克服了无数困难和挑战，展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毅力。虽然在战争初期由于装备和训练的不足，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处于劣势，但凭借着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和顽强不屈的精神，中国人民最终拖住了日本的大部分军队，为盟军在其他战场的胜利创造了条件。这同样体现出了社会一般阶层对于中国抗战走向的决定性作用。

5.2.6 日本：军国主义盛行的社会

在二战期间，日本社会深受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军国主义教育和宣传从儿童时期便开始渗透，学校教育、青年组织和媒体宣传不断灌输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日本政府通过这种系统性的意识形态灌输，成功地在全国范围内培养了一代愿意为天皇和国家牺牲的忠诚公民。

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日本国民普遍支持参战。许多日本人认为，通过战争可以扩展国家领土，获取更多资源，提升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地位。这种信念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认同，特别是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初期，日本的军事扩张得到了广泛的公众支持。日本社会在战前和战争初期充满了战争热情和民族自豪感，许多年轻人积极参军，准备为国家利益而战。

然而，随着战争的推进和战局的恶化，日本国民的情感逐渐发生了变化。战争带来的经济压力和资源短缺逐渐显现出来，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大幅下降。空袭和战斗的接连失败使得人们开始对战争的前景产生怀疑和担忧。尤其是当战火烧到日本本土时，民众的支持开始动摇，对战争的质疑声不断增多。

日本政府和军方虽然竭力维持民众的战争热情，但随着盟军的反攻和国内资源的耗尽，战争的残酷现实逐渐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继续战斗的无望。战时宣传不再能够掩盖真相，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开始反对战争，渴望和平。

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袭击，是日本战争进程中的转折点。这两次毁灭性的打击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城市毁灭，也彻底摧毁了日本国民的战争意志。原子弹的恐怖威力和其带来的巨大痛苦，使得日本社会从上到下都感受到了战争的最终极后果。许多曾经支持战争的日本人此时开始反思，认识到军国主义政策的灾难性后果，强烈要求结束战争。

虽然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始作俑者是裕仁天皇与其内阁，但日本国民再战争前期对国家政策的支持也间接导致日本在后期及时抗战结果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发动了对珍珠岛的偷袭，导致其遭受了原子弹轰炸的悲剧。

6 主要参战国立场选择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通过对二战时期各主要参战国的社会阶层和政治背景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家的立场选择是由其领导人和一般社会阶层共同决定的。结合古希腊三贤的思想，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这一过程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6.1 领导人的作用：哲学王/贤人的决策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均强调领导人的重要性。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国家的理想治理者应当是哲学王，即那些拥有智慧和美德的人。苏格拉底则主张由贤人来治理国家，因为他们具备真正的智慧和道德品质。亚里士多德强调混合政体中的领导人应具备中庸之道，能够平衡各阶层的利益。

在二战时期，各国领导人对国家的立场选择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选择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希特勒在德国通过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利用社会不满和经济危机，煽动民族仇恨和扩张欲望，使德国走向战争的道路。斯大林通过集权和镇压，强化苏联的中央集权和战时动员能力，使苏联社会在极端条件下展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抵抗力。丘吉尔和罗斯福凭借其政治智慧和坚定意志，动员各自国家的资源和力量，坚持反法西斯立场，最终在战争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在抗日战争中动员全国人民，尽管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但都展示了强大的领导能力。裕仁天皇和日本军部的军国主义政策，结合日本社会的传统和教育，必然导致了对外侵略和战争的选择。

这些领导人的决策不仅反映了他们的个人意志和理念，更是对其所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回应。^[9]正如柏拉图所言，领导人应当具备治理国家的智慧和美德，他们的决策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命运。

6.2 社会阶层的作用：一般阶层的支持与动员

亚里士多德将国家比作一个由多个部分组成的整体，每个部分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地位。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也强调了社会阶层在国家中的重要性。各国在战争中的立场选择，不仅依赖于领导人的决策，还需要整个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和动员。

在德国，纳粹党通过宣传和社会福利政策赢得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支持，使得极端民族主义在社会中广泛传播。这种社会基础使得纳粹党的战争政策在初期得以顺利实施，战争的热潮一度高涨。在苏联，工人和农民被动员起来支持国家的工业化和军事扩张，形成了强大的战时社会结构，这种动员能力使得苏联在面对纳粹侵略时展现出顽强的抵抗力。英国社会在丘吉尔的领导下，通过全民动员和战时经济政策，实现了各阶层的合作与支持，确保了战争的持续进行。美国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在罗斯福的领导下，通过战时经济措施和社会动员策略，成为战争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动员使美国迅速成为反法西斯的主要力量。中国的农民和工人阶级在国共两党的动员下，积极参与抗战，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种广泛的动员为中国的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日本社会在军国主义思想的驱动下，各阶层普遍支持战争，直到战局恶化和资源枯竭使得民众的支持逐渐动摇。

这些社会阶层的支持与动员，使得各国能够在战争中持续进行军事行动和经济生产，最终影响了战争的进程和结果。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国家是一个由多个部分组成的整体，唯有各部分协调合作，才能实现整体的和谐与稳定。

6.3 结论：国家和社会共同决定的命运

综合来看，古希腊三贤的思想为我们理解二战时期各国立场选择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国家的领导人（哲学王/贤人）通过智慧和决策，引领国家的方向；而社会的一般阶层则通过支持与动员，为国家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基础。两者共同作用，决定了国家的立场选择，从而影响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和命运。

正是这种领导人和社会阶层的互动，使得各国在面对战争时能够做出不同的选择，并在战争中展现出不同的命运。在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德国，通过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必然走向了对外侵略和种族灭绝的道路；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通过极权统治和集中动员，必然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和顽强的抵抗力；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坚定领导，使得英国和美国必然在战争中发挥关键作用，最终战胜法西斯

力量；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不同策略，体现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复杂局面和必然的全民族动员；裕仁天皇和日本军部的军国主义政策，必然导致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潮在战争中走向毁灭。

7 总结

本文通过社会学的视角，结合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对二战时期各主要参战国的立场选择进行了深入分析。文章首先介绍了二战的背景，随后分别对德国、苏联、英国、美国、中国和日本的社会阶层结构和政治背景进行了详细探讨，揭示了这些国家在战争中的立场选择如何受到其内部社会思想和阶层分布的影响。

在分析过程中，本文借鉴了古希腊三贤——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苏格拉底强调道德和智慧，主张由贤人治理国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哲学王的概念，认为国家应当由具备智慧和美德的人统治，并强调社会各阶层的分工合作；亚里士多德则主张现实主义政治观，强调通过法律和制度平衡各阶层的利益，确保社会的稳定与正义。

通过对各国领导人和社会阶层的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国家的立场选择是由其领导人和社会阶层共同决定的。在德国，希特勒的极端民族主义政策得到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支持，导致了德国的侵略战争；在苏联，斯大林通过集权和镇压，动员了全国的工人和农民，形成了强大的战时社会结构；在英国，丘吉尔通过坚定的领导和全民动员，确保了英国的持续抗战；在美国，罗斯福通过战时经济措施和社会动员，使美国成为反法西斯的主要力量；在中国，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动员全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日本，裕仁天皇和军国主义政策推动了日本的侵略战争，最终导致了日本的失败。

本文的分析思路是通过历史背景、社会阶层结构和领导人决策三方面的综合考察，结合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框架，阐明各国在二战中的立场选择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本文的结论不仅揭示了二战时期各国立场选择的内在逻辑，也为现代社会的治理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国家的命运是由领导人和社会共同决定的，只有当领导人的智慧和美德与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和动员相结合，才能实现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总之，本文通过历史与哲学的交叉分析，展示了领导人和社会阶层在国家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强调了政治智慧和社会动员对国家命运的决定性影响。这一研究为我们理解历史事件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社会的政策制定和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参考文献

- [1] 政治学[M/OL].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8.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zjfWzgEACAAJ>.
- [2] 于海. 西方社会思想史 (第四版) [M].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2.
- [3] 陈峰 C F. Nazui Deguo shehui jiegou 纳粹德国社会结构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Nazi Germany][M].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1998.
- [4] 李伟 L W. Sidalin shiqi de Sulian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Stalin's Era][J]. Lishi yanjiu 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2012, 2: 89-105.
- [5] 张丽 Z L. Kangzhan zhong de shehui dongyuan 抗战中的社会动员 [Social Mobilization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J]. Jindaishi yanjiu 近代史研究 [Modern History Research], 2005, 4: 123-138.
- [6] 王芳 W F. Sugeladi yu Guxila zhixue 苏格拉底与古希腊哲学 [Socrates and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J]. Zhixue yanjiu 哲学研究 [Philosophical Research], 2002, 3: 67-82.
- [7] 赵伟 Z W. Bolatu de lixiang guo 柏拉图的理想国 [Plato's Republic][M].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97.
- [8] 郭明 G M. Yalisiduode zhengzhi xue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Aristotle's Politics][M].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2000.
- [9] 王明 W M. Erzhan yu shehui bianhua 二战与社会变革 [World War II and Social Changes][M].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2010.